

胡服骑射与华夷之辨

金久红

【提要】胡服骑射的改革时期也恰恰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渐兴时期,二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矛盾而又统一。从目的上看,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其基本的出发点在于摆脱现实的政治军事窘境,克敌制胜,富国强兵;而言论上强调华夷之辨,则为其改革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就其现实实效而言,胡服骑射使赵国跃升为军事强国,加强了华夏实体的力量,客观上强化了华夷之辨。但从思想上看,胡服骑射却又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冲破了传统华夷之辨中只能以华化夷的固定范式,客观上承认了夷人的长处,将华夷之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包容与开放的观念成为影响当时与后世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关键词】胡服骑射 华夷之辨 多元一体

〔中图分类号〕 K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09) 06—0128—07

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国以强军争霸为主要目标的一次重大改革。赵武灵王不拘成例,锐意进取,力主学习和吸收北方游牧民族军事文化的长处,并仿照他们的装束、装备和战术,组建新式的骑兵部队,进行骑战。这场改革仅仅历时十年,就使赵国一跃成为当时一流的军事强国。胡服骑射的改革时期也恰恰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渐兴时期。以华夷之辨为旗帜的胡服骑射,对于华夷间现实的势力格局及其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影响的两个方面看似背道而驰,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却最终走向了统一。对于胡服骑射的政治及军事意义,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对于改革与华夷之辨的密切关系还少有研究,所以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胡服骑射的改革目的与华夷之辨思潮

作为赵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胡服骑射的发生,与赵国的地理位置、军事处境、赵氏家族一贯的北进战略、赵地的法家氛围及其当时渐兴的华夷之辨思潮等诸因素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 胡服骑射,一场摆脱政治军事窘境的重大变革

赵国的疆域,边界犬牙交错,毗邻接壤的国家民族众多,周边关系非常复杂。而且,赵国在武灵王改革以前,其军事力量并不十分强大,诸侯压境、胡骑骚扰,处于“四战之国”的境地。《史记·赵世家》记载仅赵武灵王即位后的十几年间,赵就曾被秦、魏多次打败,同时,北方被称为三胡的林胡、楼烦、东胡也趁

火打劫，多次以骑兵袭击赵国。狄人建立的中山国更被赵国视为“腹心”^①之患，其边境除东北角与燕国为邻外，三面都和赵国毗连，其战略地位可以绝河北之要，控太行之险，隔断赵国从邯郸到代地的南北通道。更可怕的是，中山还与齐国结盟，在齐国的支持下多次侵犯赵国，甚至曾一度“引水围鄙”。^②处在这种危险的境地，“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③因此，赵武灵王继位后，一心要改变这种局面。

在与三胡的多次交锋中，赵国屡屡失利，一次次失败的打击使赵武灵王不得不反思军事失利的原因：

从作战方式讲，三胡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来去无常，迅捷多变。而中原的战法是车战，适于平原会战，但一到山地，就无法施展。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戎翟之杂居中夏者，大抵皆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要抗击三胡，如果不借鉴对方的骑兵战法，没有一支骑兵队伍，就不可能指望作战的胜利。

从装束装备讲，胡人基于骑射的传统，习惯着窄袖短衣、长裤、革靴，较之于中原各国军队的上衣下裳、宽袍大袖，要轻灵得多。“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④要训练骑兵、改用骑战，还必须仿照胡人的衣着，进行服装的变革。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变胡服、习骑射”的改革计划开始酝酿。这一计划从目的上看，一方面是赵国对外防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北进战略的延伸。

远在三家分晋之前，从赵简子开始，赵氏家族就开始了向北方戎狄地区拓展势力的努力，并在三家分晋后占有了原晋国的北部地区。因为这一地方位置偏远、土地贫瘠，所以在赵敬侯时代也曾迁都邯郸，并力图南进，结果却因利益冲突招致了魏国的大举进攻，都城邯郸一度失陷，幸赖齐国假以援手，才免于亡国。赵武灵王即位后，也进行过与秦、齐的战争，可也都是接连败北。赵武灵王“欲继襄主之迹，

开于胡、翟之乡”^⑤的北进计划，正是基于这种对赵国处境的清醒认识而作出的战略转变。

此时期，法家思想的日渐成熟也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三晋之地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战国时期李悝、慎到、申不害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三晋地区的法家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偏重法律工具理性的“三晋法家”系统，加之其后在秦实行变法的商鞅，把李悝的《法经》进一步发挥，将“三晋法家”系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武灵王时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已一跃成为战国首强；齐国经过邹忌变法，也日渐强大。赵国身处三晋之地，也必然深受法家思想的浸染，这一点，从武灵王同臣子的对话中便可见一斑，“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⑥圣人治国，要因地制宜，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应该强行统一衣服、器物或礼节。赵武灵王从便利的角度阐述服制的根本，坚持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应该因时而异，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商君书·更法篇》中商鞅亦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其说法与《战国策·赵策》中的说辞简直如出一辙。虽然关于这些论述是《商君书》引了《战国策》，还是《战国策》引了《商君书》，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显见法家思想作为一种改革的理论在这一时期已经存在，而且影响颇深。所以，胡服骑射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赵武灵王对法家思想的一种实践。

（二）华夷之辨，一面争取舆论支持的文化旗帜

“华”、“夷”本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其内涵也在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

①②③⑤⑥ 《史记》卷43《赵世家》。

④ 《日知录》卷29“骑”条。

的形成,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①而此时,“‘夷’之一字,几乎变成四方异族的通名。”^②而其与诸夏主要的区别,不在种族与血统,而在社会性质与生活方式的不同。随着兼并战争与诸夏土地的开拓,华夷杂处的形势渐趋紧张,“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③在这种形势下,“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④就成为华夏诸国谨守的夷夏大防。“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⑤这种华夏优越论将以姬姓周族为中心的各诸侯国通过文化认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共同以礼乐文化相标榜,排斥夷狄对诸夏文化的浸染和对中原事务的参与。同时,王室日微、礼崩乐坏的趋势也使诸夏深感忧虑。基于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现实形势的紧迫感,夷夏之辨中也自然就有了“内诸夏而外夷狄”^⑥的政治要求。

这种夷夏观极力标榜“夷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⑦把少数民族贬低到与禽兽等同的地位,要求华夏诸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夷狄”,不要轻率地同室操戈。在这种思潮下,赵武灵王明确提出要“继襄主之际,开于胡、翟”^⑧无疑是极明智的抉择。这既是赵氏家族北进战略的延伸,同时也是三晋之地华夷之争的继续。三晋之地,夷夏杂厕最为复杂,而三家分晋之后,这种复杂的民族格局便主要由北部的赵所继承。赵简子、赵襄子时期曾一度向北部开疆拓土,“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⑨给了夷狄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所以,此时赵武灵王的这一决定等于是接过了夷夏之防的这面大旗。选择胡地中山作为突破口,既可以“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⑩还可以“序往古之勋”,^⑪延续赵氏祖上排夷的荣耀,征得华夏诸国的支持,至少也赢得他们的中立。同时,赵武灵王也可以藉此获得臣子们的理解。将要施行的胡服骑射,不是像公子成等人认为的那样要“佛学者,离中国”,^⑫而是要像“舜舞有苗,禹坦入裸国”^⑬那样,最终征服夷狄。从《战国策》及《史记》等史料所记载的这场君臣论战看,相较于法家实用主义的那套说教,还是“将继

简、襄之义以顺先王之志”^⑭的这一攘夷方针产生了更多的说服力。

当然,如果从目的性上分析,较之于赵武灵王整军图强、摆脱现实窘境的迫切的政治军事诉求,“华夷之辨”又显然只是一个旗号罢了。但这一旗号在当时确实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在列国争雄的时节,虽然“尊王”只是诸夏团结的一个象征,但“攘夷”却是诸夏政治上与文化上高度统一的一种现实要求。齐桓、晋文等实力诸侯正是因为应时而动,才得以称霸中原。霸主已经成为实际上华夏团结的中心,所以对于每一个诸侯而言,都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这也就难怪赵武灵王要高举攘夷大旗,把胡服骑射改革的目标之一定为“胡地中山吾必有之”^⑮了。

二、胡服骑射的改革结果与华夏族实体力量的增强

胡服骑射作为一场军事、文化的大变革,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改革使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灭中山,破三胡,设三郡,筑长城,赵国一跃成为与齐秦相伯仲的军事强国。

胡服骑射推行一年以后,赵国就有了向山地和草原进军的骑兵,从此即开始了大力打击中山和三胡的战争。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5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二十一年,攻中山。”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二十七年……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即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则转以主父的身份,“将士

① 陈致:《夷夏新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王玉哲:《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中国古代史卷》(上),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③ 《公羊传·僖公四年》。

④ 《左传·鲁定公十年》。

⑤ 语见《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

⑥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⑦ 《左传·闵公元年》。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 《史记》卷43《赵世家》。

大夫西北略胡地”。赵惠文王二年（公元前297年），武灵王率兵巡视新占领的地方，从代地出发，“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①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最终灭掉了中山。

在向胡地进军的过程中，骑兵可以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春秋以前的“经典无‘骑’字”，^②至战国前期才有打仗用骑兵的可靠记载。而且那时骑兵的数量很少，也不是独立作战的部队，而是和车兵、步兵混合编制的“车骑”。是胡服骑射的改革最早把骑兵从车兵中分离了出来，使骑兵成为了一支独立兵种，并发挥了独当一面的作用。其后，赵国名将赵奢、廉颇、李牧等都继承这一传统，不断加强骑兵建设。赵奢因善于训练和指挥骑兵被封为“马服君”，廉颇亦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马上将军，到赵国后期，李牧则“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③

在赵国的影响下，各国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春秋时期描述一国兵力，常用“千乘”、“万乘”，到了战国时期，衡量一国兵力就还要看骑兵的数量。战国时期的强国常有“千骑”、“万骑”之说。《史记·苏秦列传》就记载，苏秦在游说诸国时曾提到赵、秦、楚都有“骑万匹”，燕有“骑六千匹”，魏也有“骑五千匹”。苏秦游说虽多夸张之辞，但这多少也能从侧面说明各国对骑兵建制的重视。近年来，在陕西临潼秦俑坑出土了不少骑兵俑，还有骑兵和车兵、步兵、弩兵四个兵种组成的军阵，都反映了这一时期骑兵的日益发展。这无疑大大强化了华夏诸国的军事战斗力。

华夏族实体力量的增强有力地遏制了四夷势力向中原地区的渗透，在现实力量对比中强化了华优夷劣的态势。当时夷狄对华夏族的劫掠不可避免地多少带有蛮族征服的性质，所以，赵国的强大以及华夏实体的增强，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先进文化的作用。

赵武灵王在“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④之后，在赵国西北地区还采取了巩固国防、开发边土的一系列措施。不仅修筑了一条宏伟的赵长城，而且在北边“置云中、雁

门、代郡”，^⑤在郡下划县，设置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加强了对边地的有效管辖。此外，还“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⑥把奴隶从内地迁到九原去充实国防，既增加了边地的农业劳动力，也加速了边地的开发进程。这些措施对于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加强局部地区的统一，乃至保护和传播较先进的经济、文化，也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胡服骑射的思想影响与传统华夷之辨文化观的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华”、“夷”的观念虽然经历了从种族区别到文化区分的逐步过渡，但是这种文化区分，也仍然捍守着两个基本的原则。

其一，华夷两种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华优夷劣。

在华夏人看来，华夏人是最文明的，华夏民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如《史记·赵世家》中公子成便宣称：“中国者，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原之地作为群贤汇聚、物产丰富的文明礼仪之邦，是高高在上的，是夷狄应该敬仰和学习的，二者存在明显的高下之别。

其二，华夷之间是可以转化的，而华夏族能接受的却只能是以华化夷。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⑦这虽是晚出的说法，却是对华夷之辨文化选择的一个生动阐释。随着历史的发展，夷夏之别逐渐不再绝对地建立在自然血统之上，关键更在于尊崇的是何种礼，夷狄通过文明的熏陶与教化，也可以变为华夏的一员，而诸夏

① 以上引文均见《史记》卷43《赵世家》。

② 《日知录》卷29“骑”条。

③ 《史记》卷102《张释之冯唐列传》。

④⑤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⑥ 《水经注》卷3《河水》有：“《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通子戍吏，皆貉服矣。”

⑦ 《韩昌黎全集》卷11《原道》。

之国如果僭乱不礼，也可能退为野蛮的夷狄。楚国虽出自荆蛮之地，因其处处维护华夏礼制，就最终成为了华夏的一员；吴国公族虽出自周室，因随越人习俗，就被视为了蛮夷。可见，在这种转化中能得到人们认可和拥护的只能是以华夏来教化夷狄。

孔子力持夷夏之防，就曾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① 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② 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赵武灵王能看到夷狄的长处，并公开地学习和效仿，在客观上对这种文化歧视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华夏族主动向周边少数民族学习的第一次有益尝试。它的成功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即使总体上“四夷”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华夏族，但他们也有很多值得华夏族学习的地方，中原华夏族不应停留在对“四夷”全盘否定、视其为“禽兽”的狭隘无知的层面上。它创造了一个“以夷化华”的成功范例，而且，这个范例生动地说明，夷夏文化之间不仅可以以华化夷，而且可以彼此借鉴、相互转化。

这场以华夷之辨为旗帜的重大改革，对于华夷间现实的势力格局及其华夷之辨的思维范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如果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上看，就不难发现，这一影响的两个方面看似背道而驰，却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上最终走向了统一。虽然在当时势力格局的变化中，赵国及华夏族实体的强大强化了华优夷劣的态势，捍卫了华夷之辨，它也促进了局部地区的统一，保护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为日后以华夏族和华夏文化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从长远上看，它在思想观念上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华夷之辨中只能以华化夷的固定范式，丰富了它的内涵，促使华夷之辨的文化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开放包容的华夏族的形成、壮大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影响深远。

民族之间从排拒到认识再到认可乃至融合，需要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观念上的突破、这种淡化了民族歧视的民族认识就为政治

管理上走向“天下一家”，提供了思想上的根基。

春秋以前，中国还处在小国寡民的邦国时期，血缘关系浓厚，华夷之辨根深蒂固，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③ 对于夷狄的歧视几乎是建立在人与非人的区别上。这一点，在春秋初管仲相齐的主张中，在“戎狄豺狼，不可厌也”^④ 的尊王攘夷的口号中，仍可见一斑。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历史已进入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周室日衰，诸侯坐大，在不断的冲突与兼并中，邦国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存留下来的邦国的国土面积却越来越大。于是，“中国的政治史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小邦逐渐合并成地区性的王国，一是封建制（分封诸侯和附庸的制度）逐渐改变为郡县制（由国家任命的官吏代替受封的诸侯或附庸）。前者表明，国家的领土范围在扩展；后者表明，国家的政权在集中。”^⑤ 在这些地区性的王国中，有的新扩张的领土就是夷狄的土地，原先并不在华夏文化涵盖的区域之中。而在郡县制度下，除了少数君主家族及封有爵位的家族外，王国的庶民都是国家的百姓，都是国家以户籍著录的人口，基本上也都具有相同的身份，即所谓的“编户齐民”。也正是在这种政治上趋向统一的时代潮流下，华夏族和夷狄之间的种族差别不再像先前那样重要，人和人之间更多的体现的是同为庶民的一种平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使更多人了解了夷狄，认识了夷人的长处，脱离了视夷狄为禽兽的狭隘观念，而这种在观念上正视人之为人的开始，这种基于了解与欣赏而产生的平等意识，对于正日渐制度化的编户齐民的普及也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同时，这场变革在思想体现出的包容也深刻地影响到了赵地的民族血缘、民族性格和

① 《论语·八佾》。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左传·成公四年》。

④ 《左传·闵公元年》。

⑤ 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491页。

赵国士兵的勇敢精神。

在胡服骑射的推行中，由于当时像马镫等基本的骑具装备都不齐全，^①要在短期内训练出一支能驰善战的骑兵队伍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武灵王一方面“破卒散兵，以奉骑射”，^②对原有的车兵建制进行改编，另一方面则直接招引、收编胡人骑兵来充实国防。武灵王二十年，“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③赵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④致，就是招募，这种大力招募胡人骑兵的做法对于赵人的地域性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国虽北部多高原山地，但从全国来看，仍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文化，人民生活稳定，安土重迁，士兵亦是“其性和”、“士无死志”。^⑤而游牧部族是逐水草而居，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生活习性锻炼、塑造了他们骁勇好斗的品格。“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⑥“儿能骑羊，引弓射鼠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⑦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胡人被磨炼得勇猛彪悍。“它生活方式的流动性与文化形态的原始性，使自己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主动进取，豪迈刚健，慷慨激昂，从而与中原一带持重务实、稳定保守的农耕文明构成鲜明的对比。”^⑧随着越来越普遍的华夷杂处、交流乃至通婚，这种豪放与刚强逐渐渗透到赵国士兵乃至赵国人的性格中，于是，同周边的华夏诸国淳朴驯良的民风相比，赵人渐多尚武、豪侠的彪悍之风。尤其是代地、云中、九原等与胡狄接触较多的地方，少礼文，多骑射，“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僇悍，而武灵王益厉之”。^⑨

本来是严夷夏之防、攘夷制夷的初衷，但经过这番以改革方式的借鉴、以战争方式的征服，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性格却得以相互借鉴、彼此渗透，夷夏观因此而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较之从前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这一结果虽然并不是赵武灵王改革的本意，却成为胡服骑射最大的成功。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发展得益于此。先秦时期的华夏族正是由于一定程度的夷狄化（包括血统中加入夷狄成分和文化上接受夷狄的成分）才发展成

汉代的汉民族，而汉代的汉民族也正是由于一定程度的胡化才发展成为隋唐时期的汉民族。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实际上也包括了汉化和胡化两个方面，只是以汉化为主。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隋唐时期虎虎有生气的大一统的局面。^⑩而没有这些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的历史，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整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虽然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才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连接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⑪这个多元一体的统一性“并非依靠它能排斥或者消除异己的因素，恰恰相反，完全依靠它能兼容并蓄，然后经过融冶将不同的因素化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新整体”。^⑫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逐渐清除了民族间只能单向交流的壁垒，才使得华夏主体得以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华夏文明得以不断汲取营养，在民族的不断交往与融合中，在文化的不断碰撞与升华中，才有了中华民族如雪球般的越滚越大，才有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

本文作者：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据考古资料，到汉代为止，马具中还没有马镫。

② 《战国策·赵策二》。

③④ 《史记》卷43《赵世家》。

⑤ 《吴子·料敌》。

⑥ 《淮南子·原道训》。

⑦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⑧ 黄朴民：《“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⑨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⑩⑪ 刘家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第497、500页。

⑫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Riding and Shooting in the Hu People's Dress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Jin Jiuhong

Abstract: The time when Zhao Wu Ling Wang reform by advocating “riding and shooting in the Hu people's dress” is also the period in whi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s emphasized increasingly. These two ev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 purpose of Zhao Wu Ling Wang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is to get rid of the political difficulties to find a way to enrich the country and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so as to overpower the rivals, while the emphasi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is to win political initiatives. In reality, the reform makes Zhao a powerful State and objectively emphasiz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form, ideologically speaking, has weakened the distinction only to break the pattern to assimilate other ethnic groups into Han. The confirmation of other ethnic groups' strong points helps to develop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thnics. The ideas of tolerance and open-mindednes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sour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a unity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Key words: riding and shooting in the Hu people's dress; distinction between Han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unity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观点选萃

封建帝王“德主刑辅”观辨析

孙喆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政法系讲师孙喆认为：“德主刑辅”作为一种治国理念，源于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经孔子、贾谊等儒者的阐释，最终由董仲舒将其升华为治国之方略。“德主刑辅”作为治国方略，只是封建帝王的一块招牌，实践中并非按其行事，而是因时制宜地实施统治。

我们可以发现每当封建帝王因时制宜地处理好“德刑”关系（或以德为主、刑为辅，或以刑为主、德为辅）时，就会稳定繁盛，国祚长久。汉文帝即位后，针对高后时刑罚滥施而迅速调整了施政方针，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开创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武帝时，针对诸侯、豪强不法的局面，加大了刑罚的打击力度，史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武帝在加大刑罚打击力度的同时，也倡导尊老孝行之风，注意对人民的教化，其结果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武功文治都达到了全盛。概而言之，通过对封建帝王“德主刑辅”观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封建帝王并不是像文本记载的那样一味地固守“德主刑辅”的统治方式而是灵活地实施治国方针。批判地继承这一份历史遗产，于我们当前的国家建设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赵俊 摘编）